

# 抗战时期的在华苏联军事顾问

王 真

中国抗日战争初期，曾有大批苏联军事顾问受聘于国民政府。他们在训练中国军队，改善军队管理，提高军队战斗力，以及在重大战役的计划和实施方面，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的光辉业绩在中苏关系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页。

## 一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签订后，苏联便陆续向中国提供了大批军火援助。苏联军事顾问正是伴随其军火援助来到中国的，因为使用苏式武器装备，需要苏联专家的技术指导。早在七七事变前，即1937年2月，中苏双方在商洽军事技术协定时，就谈到派遣苏联教官来华训练中国飞行员和坦克手的问题。<sup>①</sup>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率军事代表团赴苏洽购军火援助时，在与苏方代表商谈期间，多次提到聘请军事顾问一事，恳请苏联“派遣教官，前往协助，人数可依各兵器数量再行确定”。<sup>②</sup>苏联方面欣然允诺。

中国对苏联顾问的渴求，与苏联顾问曾给中国方面留下良好的印象有关。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中的许多苏联顾问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为北伐胜利建立了殊勋。象当时曾任国民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加仑（布柳赫尔·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蒋介石对其印象极佳，抗战爆发后几次要求苏方再派他来任自己的

① *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以下只引中译名），第20卷，莫斯科1976年版，第701页，注28。

② 《中国军事代表团与苏联商谈援华抗日械弹记录稿》，《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33页。

顾问。1937年8月2日，蒋介石在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会谈时，专门提到加仑。他说，他很想会见加仑，如果加仑能来华，他很高兴。<sup>①</sup>1938年6月2日，蒋介石又电示驻苏大使杨杰，嘱其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会商，“可否派一得力总顾问如嘉仑（加仑）者来华协助”。<sup>②</sup>6月14日，蒋介石同新任驻华全权代表卢干滋会谈时，再次提到加仑，请求派加仑作他的“权威性顾问”。<sup>③</sup>加仑1927年离华回国后，任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1938年夏为远东方面军司令。正当蒋介石殷切请求苏联派他来华时，却得到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1939年6月24日，在莫斯科洽谈军火援助的孙科自莫斯科来电说：“查加仑本精军事，只以爱好女色，致堕敌方奸计，竟受敌方赠予日女，泄露机密，败坏纪律，依法罪当处死，业已执行枪决。”<sup>④</sup>蒋介石请派加仑来华的愿望成为泡影。

苏联顾问来华也是抗战爆发后中德关系日渐疏远的一个后果。苏联顾问在1927年全部离华后，国民政府一直主要是聘用德国顾问。德国的鲍尔、赛克特、佛采尔和法尔肯豪森等人先后担任过蒋介石的总顾问。抗战爆发前夕，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已近70人。德国顾问在帮助蒋介石巩固政权，“围剿”红军方面是很受赏识的。但在抗日问题上，德国顾问除在抗日初期曾一度帮助中国策划过某些作战方案、训练了一些国民党军队外，因受制于日德关系而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实际上，1936年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后，日德关系已日趋密切。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便宣布中立。1937年11月上旬和12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

---

①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0卷，第440页。

②④ 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二），台北1981年版，第341页、第423页。

③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И.Т.卢干滋—奥尔斯基与中国武装总司令蒋介石会谈记录》，《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1卷，莫斯科1977年版，第335页。

先后两次出面调停中日关系。调停被中国方面拒绝后，德国亲日倾向更明显，不久便承认“满洲国”。1938年3月，德国停止接受中国赴德受训之军事人员，5月又下令禁止军火援华，并召回在华全体德国顾问，从而中止了德中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而此时中苏关系却正值“蜜月”时期，聘用苏联顾问便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聘请苏联顾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美等西方国家这时对中日战争实行中立政策，拒绝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当时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赫里欧就对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说，英国和美国都借口军事准备不足而不支援中国，唯一与中国有共同利害关系，并能广泛支持和给予援助的国家是苏联。<sup>①</sup>这种情况也迫使蒋介石在中德关系恶化时只有聘用苏联顾问一途。

## 二

抗战初期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计达300多人。<sup>②</sup>首批苏联顾问是1938年5—6月间来华的，计27人。<sup>③</sup>但这一批顾问中的M.И.德拉季文来得要更早一些。他是在1937年11月作为苏联驻华使馆武官抵华的。不久，德拉季文便被任命为中国军队总军事顾问。来华较早的还有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后来成为著名的苏联元帅的朱可夫。他是在1938年初随同苏联的一个军事使团抵华的。但他在华时间不长，就应召回国。1938—1942年，4名苏联

①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页。

② 这是根据当年来华的苏联工程兵顾问A.Я.卡利亚金的说法，见《苏联在华军事顾问（1937—1942）》一文，载《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8年第2期。另一说为1500人，见约翰W·加佛，《中苏关系1937—1945》（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纽约1988年版，第40页。还有一说为3665人，见毛磊等编，《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后两说可能把一般技术专家和工作人员均包括在内，扩大了军事顾问的范围。

③ 一说为21人。参见（美）奥·普·钱尼，《朱可夫》，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50页。

总顾问分别是：M. И. 德拉季文，任期1937年11月—1938年8月；A. И. 切列潘诺夫，任期1938年8月—1939年8月；K. M. 卡恰诺夫，任期1939年9月—1941年2月；B. И. 崔可夫，任期1941年2月—1942年2月。

从1938年下半年起，大批苏联顾问陆续来到中国，顾问机构也随之建立。这个机构实际上是一个覆盖国民党军队各主要战区、各军兵种的顾问系统。顾问系统设总顾问，总顾问隶属最高统帅部。各战区的高级顾问一般为一名或数名。当时除第四、六、七、八战区外，各战区的高级顾问为：第一战区P. И巴宁、П. С. 雷巴尔克、M. A. 舒金；第二战区П. Ф. 巴季茨基、A. K. 别列斯托夫；第三战区H. A. 博布罗夫、A. H. 博格柳博夫、A. B. 瓦西里耶夫、M. M. 马特维耶夫；第五战区И. П. 阿尔费罗夫；第九战区Ф. Ф. 阿利亚布什夫。军兵种顾问为：空军Г. И. 索尔、П. B. 雷恰戈夫、Ф. П. 波雷宁、П. H. 阿尼西莫夫、T. T. 赫留金；坦克兵П. Д. 别洛夫、H. K. 切斯诺科夫；炮兵和防空兵И. Б. 戈卢别夫、Я. M. 塔布切科、И. A. 希洛夫；工程兵A. Я 卡利亚金、И. П. 巴图洛夫、A. П. 科瓦廖夫；通讯兵格拉诺夫；军医系统П. M. 茹拉廖夫；战术侦察И. Г. 连奇克、C. П. 康斯坦丁诺夫、M. C. 什梅廖夫。

来华苏联顾问的军政素质一般都是优良的。在军事方面，他们富有经验。如德拉季文，当时已是苏军的一名军长。来华不久，他就发现国民党军队防御作战是被动防御，效果甚差，于是便提出适时开展进攻、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的建议。1938年4月的台儿庄大捷正是这种进攻性防御的战果。最后一任总顾问崔可夫，19岁就当团长，富有指挥才能，1927年曾来华任顾问，熟谙中国情况，善于调查研究，帮助中国军队较好地制定了进攻宜昌和保卫长沙的计划。再如П. И. 巴托夫、A. B. 瓦西里耶夫，M. И. 潘克维奇、C. C. 奥格涅夫、A. K. 别列斯托夫、M. B. 维诺格拉多夫等人也很富有作战经验，有的来华前夕还参加了西班牙

牙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在政治素质方面，苏联顾问更具有优势。他们不是象德国顾问那样，以受雇佣者的身份来中国工作的，而是出于对中国人民正义斗争的同情和支持，肩负着国际主义义务，因而能更加自觉和勤奋地工作。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部队中度过的，并能常到前线，以身示范。这种良好的作风直接影响到国民党高级将领，使他们也不得不“从正襟危坐于其中的轿子里出来，与顾问们并排步行”。<sup>①</sup>

为了协调一致地工作，苏联顾问善于处理同国民党将领的关系。每逢意见相左时，苏联顾问注意方式方法，耐心说服。工程兵顾问卡利亚金在这方面有深刻体会。他说：“经验表明，顾问在某种程度上应是外交家；不应急躁，建议只能根据为文件所肯定和为历史经验所证实了的事实。需要的是一个心理学家，关心交谈者的威信，预见其意图……可以直率地说，我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同自己的‘指导对象’建立了业务上的联系，并且在华全部工作期间没有一次因损伤将军们的自尊心而出现争吵。我们的建议被认真研究，未作大的变动而加以贯彻。这是顾问同中国国家的军队战斗合作的标志，是关系和睦与互相理解的标志。”<sup>②</sup>卡利亚金的体会反映出苏联顾问的良好修养。在同国民党将领的关系上，苏联顾问在处理军队内部腐败行为时，能比较策略地抵制。崔可夫任总顾问期间，发现国民党将领往往通过向上级假报士兵花名册，将死者的军饷装进自己的腰包。他知道在国民党统治下要改变这种欺上瞒下的风气是不可能的，便在“制定抵抗侵略者的行动计划时，总是要打折扣”<sup>③</sup>，即压缩参战部队所报兵员人数，这会对发饷部门起到一种暗示作用。

在素质和军纪普遍较差的国民党军队中，正是由于苏联顾问具有良好的素养和斗争策略，二者的关系才得以维系，从而保证

①② 《苏联在华军事顾问》，《远东问题》1988年第2期。

③ 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了顾问工作的开展。

### 三

苏联顾问的在华工作主要是两大项：训练中国军队和拟定重大战役的作战计划。

训练军队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因为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和素养都很不理想。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有现役兵力180万，但其训练程度和战备工作均不够。据当时任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说：“我在前线常看见未经训练而开赴战场之士兵，无论就作战技术或作战精神皆不能称之为战斗员，仅是备员而已。”他在总结淞沪作战的教训时指出：“我军训练远不如敌人，使用同一武器之命中率亦远逊于敌人，步兵对轻重武器因训练不精，不能使用自如，未发挥较大之威力。”<sup>①</sup>苏联顾问来华后，训练中国军队便成为当务之急。他们采取分层次、分兵种的训练方法，力争在短期内将全新的素质灌注到中国军队中。对于司令部工作，他们注重计划的制定、作战经验的总结、侦察部队的组织以及部队管理方法和管理机构的改善等；对步兵主要是注重野战训练，在各种战斗中如何使用武器、工程设备和利用地形等；对空军主要注重训练同地面部队的配合、通讯、新机场的伪装，以及培训飞行员等；对炮兵和防空兵则训练在防御和进攻中使用炮火，从隐蔽阵地射击，在部队和居民点组织对空防御，改善炮兵部队的组织结构等；对工程兵注意训练选择防御地带、防御工程设备和火力设施的使用及其在炮火区和支撑体系中的配置，利用永久性工事的要素，废墟和障碍物的布局及其克服方法等。与实践性训练相配合，苏联顾问也十分重视军校的理论教育。据统计，当时有9万中国军人在军校中学习，由苏联顾问和教官教授有关课程。

除这种普及性训练外，苏联顾问还在湘潭建立了训练基地，专

---

<sup>①</sup> 《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112页。

门训练坦克手。中国当时从苏联购进的82辆T26型坦克全部集中到这里。1938年3—10月，在苏联顾问切斯诺科夫少校领导下，由苏联教官拉博夫斯基、布拉托夫、齐甘科夫、加利钦、米哈依洛夫等10多名教官具体指导，训练和研究坦克及其技术装备的使用，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军队第一个机械化师，后又扩充为第五机械化军。苏联顾问的训练有效地提高了中国军队的作战技能，所以，蒋介石曾多次请求增派苏联顾问。据顾问写道：“中国政府告知苏联政府，在它派来顾问后……在中国武装抵抗侵略方面具有重大成效。并且所有来华援助的苏联顾问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感激。”<sup>①</sup>

在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方面，苏联顾问表现出他们的魄力和才华。他们来华后，参与了数以百计的攻防作战计划的制定，其中包括象武汉、南昌、长沙、宜昌等重大战役。

武汉战役是国民党战场战略防御阶段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日军共出动10多个主力师团，另有军舰（万吨以下）100艘，飞机至少400架。为保卫武汉，国民党军队调动了133个师又13个团，计百余万人。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指导方针是：“以各军之主力分布于武汉外围，巩固武汉之核心。更利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预筑坚固阵地，及沿长江两岸、鄱阳、大冶等沼泽地带，及田家镇、马垱两岸构筑江防要塞与敌作战略上之持久战，并保持重点于外翼，争取机动。”<sup>②</sup>这种兵力部署看来固若金汤，实则仍是低效能的被动防御。鉴于这一点，德拉季文总顾问在1938年7月底向蒋介石提出第三、五、九战区实行以攻为守的计划，建议在每一战区建立武器良好和得到加强炮火的突击群，击溃进攻武汉的日军。苏联顾问迁到信阳、罗山地区执

① *Лени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я*, (《列宁主义的苏联对华政策》)，莫斯科1968年版，第105—106页。

② 《白崇禧回忆录》，第138页。

行抗击任务的师一级单位指导防御作战和协助地面部队，解决与苏联志愿空军在作战中的协同问题。<sup>①</sup>8月，切列潘诺夫继任总顾问后，也坦诚陈词，提出一项更为具体的积极防御的作战计划。他分析了日军沿长江进攻可能会暴露的弱点，即其“楔形冲击”的突击群易与后续部队脱离，这“就象一个沿着树枝上的蛛网落下的小蜘蛛”，随着向前运动而最终吊死在“线上”。因此，切列潘诺夫建议，除了在敌人进攻的道路上组织防御性阻击外，要以主要方向往北和往南集中后备力量，就象雪崩一样压到突击群的侧翼和后方，切断其后勤基地并向长江移动。<sup>②</sup>切列潘诺夫的作战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放弃消极防御，实行积极防御。为此，他还建议在日本人没有进攻的地方，中国军队不应被动地守卫，而是要转入进攻，深入敌人侧后作战；在敌人占领阵地较为巩固的地方，应显示出准备进攻和不断地用侦察性作战警告敌人；在敌后方的游击队应与前线军队协同配合作战等等。应当说，切列潘诺夫的作战思想确实是针对了国民党军队战略防御阶段的弊端。如果武汉战役前国民党军队就能实行积极防御，战局有可能是另一种结果。切列潘诺夫提出自己的计划后，还考虑到计划的可行性问题。他认为在国民党军队武汉会战作战方针已形成的情况下，他的计划不需对原方针作大的变动即可执行，因为这不需要对集中在主要方向的国民党军队80个师进行大的调遣，“需要的只是他们不要一个个相互挨着地站在那儿，其中一半以上应向长江以北和以南集结，以便在反攻时他们能够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去。要调动的是一段不太大的距离，而在中国军队和师团没有辎重的情况下，每条路对他们都是方便的”。<sup>③</sup>这种可行性计划进一步体现了苏联顾问的务实精神。然而，苏联顾问的作战

①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01页。

② 参见A.И.切列潘诺夫：《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в Китае》（《在华军事顾问笔记》）莫斯科1976年版，第631页。

③ 《在华军事顾问笔记》，第633页。



计划没有立即被国民党军队采纳，只是在后来消极防御失利时，他们才逐步感到有实践这一计划的必要性，但这对整个战役来说为时已晚。

由苏联顾问拟定作战计划的另一重要战役是宜昌战役。宜昌战役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作战的一次重要战役，于1940年5—6月间展开，其目的是粉碎驻守在宜昌—荆门—荆州三角地带的敌集团军，占领宜昌并继续向东挺进，收复失地。1940年三四月间，总顾问崔可夫等人就制定了宜昌战役的计划。在将计划提交蒋介石之前，崔可夫深入前线部队，找担任此战役重要作战任务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及其他将领谈话，并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历时近3个星期，最后商定和修改了作战计划。回重庆后，崔可夫向何应钦报告了这次调查情况，指出日军由于长时间处于消极防守状态已丧失进攻勇气，而且凭这一地区的兵力和储备不可能展开大规模攻势，陈诚部队却退可守进可攻，凭借长江航道上险要的地势坚固的工事，只需要少量兵力便可抵御强大之敌。报告还指出日军各据点相距较远、孤立分散的弱点，提出可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将敌歼灭。报告被转呈蒋介石，崔可夫“后来听说，他（蒋介石）很欣赏这个报告”<sup>①</sup>。宜昌战役开始后，陈诚部按计划进行作战。5月中旬，第二、三十集团军攻抵当阳至荆门以北地区，十八军收复宜昌。重庆还举行了“宜昌大捷”庆祝会。然而就在此时，蒋介石竟下令停止进攻，结果日军卷土重来，又攻陷宜昌，并据城防守，致使中国军队反攻无效，只得转入对峙。

继宜昌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同日军进行殊死较量的便是长沙战役。长沙战役从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间断进行过3次。苏联顾问参与计划和指挥的主要是1941年9月进行的第二次长沙战役。是役，日军集结兵力12万多人，企图消灭国民党军队第九战

<sup>①</sup> 《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132页。

区薛岳部之主力。国民党军队集中兵力为18万人。战役前期，日军攻势凌厉，强渡新墙河，击溃中国守军，进逼长沙，形势危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紧急召见崔可夫，征询对付日军攻势的建议。崔可夫和其他顾问一起迅速拟定了反击日军进攻的计划。这个计划有3个基本点：1.中部防线的守军且战且退，诱敌至长沙东北和以东的山间狭路，路两侧埋伏配备苏式重炮的部队，集中歼敌；2.当敌军陷入山间狭路遭伏击时，长沙正面的守军进入主要战斗；3.从侧翼猛攻向长沙进攻的日军。同时，崔可夫还计划第五、六战区主动进攻汉口，迫使日军不能两顾而停止进攻长沙。崔可夫带着这份计划面见蒋介石。蒋起初有些犹疑，但经说服便接受了，并要崔可夫监督计划的实施。崔可夫又请蒋介石批准动用全部空军打击对长沙威胁最大之敌军。为避免计划泄露，崔可夫还请何应钦不要在军委会议上讨论这一计划。计划实行时，果然奏效。陷入我方埋伏的日军遭重炮轰击，损失巨大，丢下遍地尸体而逃窜。驻扎在黄花市的国民党军队对敌主力兵团的后方和侧翼发起猛攻。第五、六战区的国民党军队也转入反攻，威逼宜昌、荆门和汉水，直指武汉。这样，日军难以招架，只得于10月1日开始后撤，第二次长沙战役遂告结束。蒋介石得此消息后甚喜，特邀苏联顾问一起乘坐他的专机飞往长沙观看战果，可见他对苏联顾问在此次战役中的作用是肯定的。

苏联顾问援华期间，对中国空军的训练和作战也给予了许多帮助。为训练中国飞行员，苏联向中国派遣了89人组成的苏联航空专家组。他们中间有著名的苏联空军顾问П.Ф.日加列夫、П.В.雷恰戈夫、Г.И.索尔、П.Н.阿尼西莫夫、А.Г.雷托夫、Ф.П.波雷宁、Т.Т.赫留金等。这些苏联顾问成熟老练，经验丰富。象雷恰戈夫在援助西班牙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空战中曾击落20多架敌机，27岁来中国时已成为苏联英雄。索尔也参加过西班牙保卫战，在那里共完成102次作战飞行。当时中国急需飞行员，苏联专家就帮助中国在伊犁、兰州、绥宁、成都等地

建立了一批航校。仅伊犁航校，苏联就投资6860459美元，用于建校舍，购置武器、器材等。该航校配备22名苏联教练，按每架飞机的学员3—4人（飞行、领航、射击、报务）的配备进行训练，到1940年中，已培训了328名中国飞行员。为加快培训速度，中国受训人员还被送到苏联培训。至1940年夏，中国空军已有1045名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报务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这就大大加强了中国空军战斗力。苏联顾问还十分注重对中国飞行员的实战训练。为此，他们建议中国飞行员编入苏联机群。飞行中，苏联飞行员以身示范，向中国飞行员传授射击、投弹、跳伞、滑翔、联络、领航等技术。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飞行员的战斗技术水平，而且增进了中苏友谊。这正如参加过中苏联合编队的苏联志愿飞行员C.B.斯柳萨列夫后来回忆所说：“我们所有的共同飞行自始至终都是很成功的，战果辉煌。在同日军歼击机的空战中，互相支援和火力协同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在轰炸机编队中并肩飞行，苏联飞行员在左边，中国飞行员在右边。驻在一个机场上，生活在一起……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感到有信心，作战很勇敢，从不离开编队。必须指出，共同的战斗行动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们的友谊是真诚的，是在对共同的敌人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sup>①</sup>正是在这种协同作战中，中苏飞行员给进犯日机以重创，取得了辉煌战绩。

#### 四

苏联顾问的援华工作一直持续到1942年初。在他们来华4年左右的时间里，对中国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苏联顾问回国后，便立即投入伟大的卫国战争，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被授予元帅或将军军衔。毫无疑问，援华抗战的贡献是他们晋升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得以拔擢的苏联顾问是：苏联元帅П.Ф.巴季茨基、B.

<sup>①</sup> 《在中国的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0—141页。

И.崔可夫,兵种元帅П.В.雷恰戈夫、П.Ф.日加列夫、П.С.雷巴尔克、К.П.卡扎科夫,将军А.Н.博格柳博夫、А.Г.雷托夫、М.И.德拉季文、А.И.切列潘诺夫、К.М.卡恰诺夫、А.Я.卡利亚金、Р.И.巴宁、И.П.阿尔费罗夫、Ф.Ф.阿利亚什夫、А.В.瓦西里耶夫、Г.И.索尔、Н.В.斯拉温、М.П.茹拉廖夫、М.И.布洛欣、А.В.特鲁索夫等。

从苏联顾问在华期间的全过程来看,同中国方面的合作是融洽和谐的,但也存在一些磨擦和隔阂。例如,武汉会战时,苏联顾问提出将新组建的机械化师投入战斗,蒋介石却不同意。由于总顾问切列潘诺夫的坚持,直至1938年10月底,才出动一个坦克团到平江地区,遏制了由汉口向南进攻的日军。由此可见,若是将机械化师早点投入战斗,将有利于保卫武汉,对敌杀伤也会更大一些。再如,在宜昌战役中,蒋介石中止国民党军队执行苏联顾问的进攻计划,这显然是宜昌得而复失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蒋介石之所以做出此举,崔可夫认为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将领们缺乏战斗到底的勇气”。<sup>①</sup>又如,切列潘诺夫曾提出改组军队的建议,要求各军兵种协同作战时服从全军统一指挥,特别是要加强军队的情报工作,“但是,最高指挥部只不过是表面上同意了 this 建议,后来并无下文”。<sup>②</sup>苏联顾问的热心得到的只是冷遇,因为在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的情况下,这种触及其内部机制深层次的改革是不会受到欢迎和得到响应的。苏联顾问对蒋介石及其将领的这些做法颇有感触。1938—1939年间在华的苏联顾问С.П.康斯坦丁诺夫后来回忆说:“作为这些事件的目击者,我要强调指出,国民党军事将领的墨守成规与因循守旧和蒋介石的两面手腕,妨碍了我的许多建议的实施,这些建议本应受到重视,得到支持。平庸无能的国民党将领总是竭力限制苏联军事顾问发挥作用。”<sup>③</sup>

① 《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第137页。

②③ 《在中国的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第236页,237页。

客观地说，苏联顾问的每一项具体建议不可能完全正确，但从其总的精神来看，这些建议都是为了改变国民党军队的消极防御态势、提高国民党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而提出的，因此是积极合理的或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而蒋介石及其将领对某些合理的或具有合理因素的建议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其具体原因恐很复杂，但基本原因却很明显，即不想更多地承担抗日的重担，而是想把它转嫁到苏联和英美身上，因为苏联顾问的建议是要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来实现的。抗战爆发前后，蒋介石曾多次请求苏联参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期望英美能对中国战场有更多的投入，这都表明蒋介石依赖外援、保存实力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苏联顾问同蒋介石政府的密切合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苏联顾问同蒋介石政府的合作关系得以维系住，主要是由于中苏两国当时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此外，与苏联顾问的宽容与豁达也有关。曾任空军顾问的C.B.斯柳萨列夫后来回忆说：“到1938年12月，我们同中国最高当局的关系开始恶化。蒋介石时常破坏和苏联签订的协定，越来越投靠美国人。”<sup>①</sup>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顾问的服务人员被更换，伙食也不如以前，顾问们提出的问题得不到答复，外出活动也受到限制。但是，斯柳萨列夫等人没有计较这些，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直至完成自己的援华任务。到后来，苏联顾问受到的非礼远不止这一些。据另一位苏联顾问康斯坦丁诺夫回忆说，一次他乘车在华南山路上行驶，左前轮突然飞掉，车子向悬崖边滑去，幸亏他迅速跳出车外，才避免了一场灾祸。后经调查，才知道车轮螺丝事先被人松开。<sup>②</sup>康斯坦丁诺夫还说，苏联顾问的周围经常潜伏着戴笠手下的特务，监视顾问们的行踪。这位顾问甚至在30多年之后，每逢

---

①② 《在中国的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第151页；252页。

想起心里仍然感到不快。① 尽管如此，苏联顾问还是坚持工作，克尽职守，忠实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表现出高尚的境界和良好的修养。这一点也正如康斯坦丁诺夫所说：“个人的行为不能与中国人民的斗争事业相提并论。”②

苏联顾问同蒋介石政府的合作关系维系到1941年便难以为继了。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国内急需大批将领，同时，苏联顾问因对国共冲突的诘问也引起蒋的日益不满。这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英美对日宣战，蒋介石对外政策的指针明显地偏向西方，姗姗来迟的美国顾问开始取代了苏联顾问，苏联顾问便陆续返回祖国。至1942年2月，苏联顾问基本上都已离华。中苏两国在抗战初期“蜜月”般合作的历史也就此结束。

（作者单位：大连海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

---

①② 《在中国的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1925—1945）》，第251页。